

南宋定都临安原因初探

林 正 秋

金军攻陷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北宋王朝宣告结束。南宋政权在南京(今河南商丘)重建。但由于军事上的继续溃退,在南京仅呆了五个月又被迫南迁。短短的二、三年中,又先后建行都于扬州、建康、杭州、越州等地,长则一年多,短则仅百日。南逃途中,南宋朝臣纷纷议论迁都何处为宜的问题,大多主张移驻东南建康,少数要求迁都杭州。但是南宋却最后定都临安(今杭州市)达一百四十年之久,其原因安在?过去学者少有涉及,本文试从定都的历史背景与杭州在北宋时期的迅速发展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正于史学界的专家学者。

(一) 南宋初年的军事势态与定都临安的关系

1127年3月,女真贵族攻陷汴京,徽、钦二帝“北狩”,皇室财富被掳掠一空,北宋王朝覆灭。

就在这年五月,领兵在外的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抗金将领宗泽等的拥戴下,登基于应天府,改年号为“建炎”(1127~1131年),史称南宋,赵构就成了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即宋高宗。

南宋政权建立初年,由于金军步步进逼、宋军节节败退的军事形势,应天府不能久呆,必须再度搬迁都城。于是迁都问题成为南宋统治者稳定新政权与抵挡金军南侵所必须立即考虑并迅速抉择的首要问题。朝廷上下,议论纷纷,文武群臣,齐献方案。在建炎年间,高宗与廷臣一起商讨迁都事宜,争论激烈者就有三次。第一次议都是南宋政权于南京立脚仅一、二个月时就展开的。首先是抗战派李纲发难。据《吕中大事记》载,有三种方案:“李纲请营南阳”,宗泽请幸汴京,汪、黄请幸东南,三者不同^①,争论的焦点是坚守中原还是巡幸(迁都)东南。李纲在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军事形势后说:“今日之事,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提出了并建三都的设想。他说“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宜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宫室、积粮粮,以备巡幸。”^②这是从当时南宋政权刚刚建立,军事上挡不住金军锋芒的特定形势着眼的。他认为“并建三都”的好处有三:“一则藉巡幸之名,使国势不失于太弱;二则不置定都,敌人无所窥伺;三则四方望幸,奸雄无所觊觎。”所以他认为“三都成而天下之势安矣。”^③这次议论,因高宗举棋不定而未作结论。但是,军事的迅速溃退,敌人的兵临城下,却替当权者作了裁决。次月,高宗急急乎下手诏说“巡幸东南为避敌之计。”许多大臣上书表示支持,卫尉少卿卫肤敏上言:

“汴都蹂践之余,不可复处。睢阳封域不广,而又逼近河朔,敌易以至。唯建康实古帝都,外连江、淮,内控湖、海,负山带海,为东南要会之地。”^④

中书舍人刘珪进一步阐述定都建康的有利条件:

“臣闻:近臣有欲幸南阳者。南阳密尔中原,虽易以号四方,但今日陈、唐之郡,新割于乱,千乘万骑,何所取给……夫骑兵,金之长技,而不习水战。金陵天险,前据大江,可以固守;东南久安,财力富盛,足以待敌。”

经过君臣的议论商讨,认为迁都建康是可行的:第一,建康是六朝故都、东南要地;第二,东南久安,财力富盛,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第三,凭险长江,有利于军事上的固守。

就这样,迁都建康从商议变成了定论。赵构在商丘仅呆了五个月,便弃城出走了。

同年十月,高宗一行逡巡到了江南名城扬州。原想喘一口气,再渡江“巡幸”。谁知刚过了一年多,金兵又跟踪驰至,速度之快是高宗意想不到的。建炎三年(1129)二月,赵构仓卒过江,狼狈逃往扬州对岸的镇江。这时,他预感到镇江、建康等地濒临大江,离前线太近,还不安全,即于镇江召集文武近臣再度商议下一步的“巡幸”计划。这是第二次讨论迁都。这次讨论与第一次不同的是,高宗首先提出方案,让大家选择,这也反映了他的逃跑心切。因为历经交锋,他对金、宋军事实力的对比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害怕长江天堑未必挡得住金兵马蹄,所以他说:“姑留此,或径趋浙中邪?”^⑥这句话的倾向性是极其明显的。当时吕颐浩乞留建康,群臣附议;独有王渊异议,提出“请幸杭州”的主张:“镇江止捍得一处,若金自通州渡江,先据姑苏,将若之何?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阻。”^⑦此议虽未获几多支持,但正合赵构心意,于是当即决定:径趋杭州。彼时高宗心情之急迫,还可以从一件小事上看出:会议中途,朱胜非外出一会儿。待胜非重返会场,高宗立即告诉他:“适议定,不若径去杭州。”并指令朱胜非留守镇江,处置遗事。因此,有人把迁都杭州这件事归咎于奸臣秦桧,是缺乏史实根据的,至少从现有史料来看,尚难以判定。

另有一件事也值得提一下。高宗一行途经平江府,赵构曾召当时已任集英殿修撰、提举杭州洞霄宫的卫肤敏入对。卫也坚持说:“余杭地狭人稠,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未有作都者,惟钱氏节度而窃居之,盖不得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其地深远狭隘,欲以号令四方,恢复中原,难矣!”^⑧但他一看皇上的脸色,知道迁都杭州已是高宗的既定方针,再多说也是无用,就马上自己转圜,接着说:“为今之计,莫若暂图少安于钱塘;徐诣建康。”^⑨表示尊重赵构的“圣裁”。卫肤敏这一番话说得很得体。这种貌似折中,实为附议的论调,安抚了群臣,支持了高宗,深得上心,迁都杭州就此事实上定了下来。

二月壬戌(十三日),南宋君臣到了杭州。“诏令”改州治为行宫,以显宁寺为尚书省,赵构打算偏安于钱塘了。不料三月初发生了扈从统制苗傅及刘正彦的兵变,“迫帝逊位于皇子魏国公,请隆祐太后垂帘同听政。”^⑩给了高宗当头一棒。后经多方面地做工作,拖了一个月,赵构才勉强复位。这个意外打击,使高宗觉得有必要重视一下舆论的呼声,做出一些抗战复国的姿态来,以保自己刚从地上捡起来的皇冠;于是“颁诏”立即移蹕建康,表示志在抗金。然而,战局的进展十分不利于宋,宋军继续溃退,建康眼看不保。就在这四面楚歌的危急形势下,高宗第三次召集随驾百官与诸统制共商“巡幸”之事。这次讨论迁都,与以往两次不同的有二:战局进一步严重,使群臣比较冷静地考虑主客观的可能性;其次,赵构接受兵变教训,虽有“御裁”也多让大家分析利弊。讨论一开始,高宗先提出三种方案,要大臣们抉择。他说:“朕若定居建康,不复移蹕;与夫右趋鄂、岳,左驻吴、越,山川形势,地利人情,孰安孰否,孰利孰害?”当时会上气氛热烈,群臣所提方案也多,就中较有影响的是张浚和马扩

的意见。张浚提出迁都武昌，吕颐浩附议，但招来江浙籍官僚的激烈反对；马扩则提出“上策幸巴蜀，中策都武昌，下策驻蹕建康”的“三策”论，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总括反对者的意见是：“鄂、岳道远，馈饷难继，又虑上驾一动，则江北群盗乘虚过江，东南非我有矣。”^⑩御史中丞张守和谏议大夫滕康是最激烈的反对者。张守指责说：“东南今日根本也，陛下远适，则奸雄生窥伺之心，况将士多陕西人，以蜀近关陕，可图西归，自为计耳，非为陛下与国家计也。”^⑪以张邵为代表的一批臣下，还明确提出“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建都金陵，因江、淮、蜀、汉之资以图恢复”^⑫的主张，要求赵构不要逃跑。迫于“建都金陵”的呼声有相当影响，高宗只好决定暂留建康。

但是，形势越来越严重，建康危若累卵。赵构心神不宁自不待言，就是百官群僚中希望权都杭州的人也越来越多。尚书考功郎楼炤就曾上奏高宗：“今日之计，当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计。力可以保淮，则以淮南为屏蔽，权都建康，渐图恢复；力可以保淮南，则因长江为险阻，权都吴会，以养国力。”^⑬此言正中高宗下怀，赵构下决心了：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准备移蹕迁都。可是，金兵铁蹄已践江南，尾追不舍；高宗只得一路逃难，由越州而明州，最后无奈，把小朝廷装进几只船内，从定海逃往温、台。金兵下海追了三百里，幸遇台风暴雨，金人被迫引兵而去。这样，南宋政权才北返越州。公元1131年，升越州为绍兴府，作为行都，改年号为“绍兴”。在绍兴只耽了一年多，又以“漕运不继”而迁往临安府了。绍兴八年(1138)，终于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这是南宋第二次迁都临安。

当然，终南宋之世，定都杭州虽属既成事实，移蹕建康之议仍绵延不绝；因为山河破碎，国耻未雪，一些爱国志士总是未能忘情于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大业，如陆游在《上二府论都邑劄子》中慷慨激昂地大声疾呼：“然某闻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都者。吴尝都武昌，梁尝都荆渚，南唐尝都洪州(今南昌市)，当时之计，必以建康距江不远，故求深固之地，然皆成而复毁，居而复徙，甚者遂至于败亡。相公以为此何者？天地造设，山川形势有不可易者。车驾驻蹕临安，出于权宜，本非定都；以形势则不固，以馈饷则不便，海道逼近，凜然常有意外之忧……。”孝宗时，大臣吴悦上过《乞驻蹕建康疏》^⑭，王阮在《试礼部对策》中还具体分析临安与建康的地理形势，指出建康“其地利于进取”^⑮。孝宗即位之初，也曾下诏经理建康，以图进取。

然而，自公元1138年杭州正式定都以来，迄宋亡终未他迁。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金兵处处主动进击，宋军时时被动防守，这是战局的长期势态。以骑兵为主的金军咄咄逼人，随时随地都可能发起进攻；而建康靠近前线，不如杭州地处后方，比较安全。浙西一带水网地区，对骑兵活动是不利的地形；正如赵构所看到的：“朕以为金人所恃者骑众耳。浙西水乡，骑虽众不能骋也。”^⑯这就更为杭州增添了一道天然屏障，也给统治者增加了安全感。

另一方面，唐宋以来，杭州迅速崛起，一跃而为万物富庶的“东南第一州”；而这种相当规模的城市体制和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恰恰是作为国都所必需的。

(二) 杭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定都临安的关系

杭州的前身是地处武林山麓的钱唐县,仅数千户人家散居其中。历六朝的逐步发展,至隋代,县城已沿钱塘江东移到凤凰山下的柳浦,成为杭州余杭郡的州治所在地。隋开皇十一年(591),杨素发动居民,依凤凰山筑起了州城,方三十余里,杭城规模初具。炀帝时,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与钱塘江五大河流的京杭大运河又通航了,这使杭州身价日隆,“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商贾并臻”^⑩的声名远播。此后,迭经唐代三百年对西湖的疏浚和整治,解决了今武林门一带至海宁的农田灌溉;六井的开凿,又使西湖东侧平陆的居民能饮用上淡水。中唐的州城,就从原来的江干向北延伸,城区扩大到今武林门。城南江干一带成了钱塘江运输的著名码头,城北武林门外也形成运河舟楫物资的集散地。人口从隋代的一万五千户,增至唐开元年间的八万六千户。“骈橈二十里,开肆三万室。”^⑪商税岁入五十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二十四分之一^⑫。迨至五代十国,杭州成了吴越国的首府。吴越兴筑城东捍海塘,拓广平陆,“广郡郭周三十里。”^⑬钱镠两次扩建城墙,又使城区面积扩充到七十里之大。“钱塘富庶,由是盛于东南。”^⑭

进入赵宋王朝,杭州即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

综观北宋时朝杭州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城市人口的增加。有唐一代,户口最多的是开元年间(713—741),八万多户。吴越时期。无文献记载,无法统计。到了北宋初期,杭州人口已达十万户。柳永(987—1053)《望海潮》一词有云:“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参差十万人家。”张咏守杭州时也说钱塘有十万家。^⑮元丰年间(1078—1085)续增至二十万二千八百多户。据《宋史·地理志》统计,崇宁年间(1102—1106)杭州人口已达二十万三千五百七十四户,超过江宁(十二万七千七百七十七户)、平江(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一户)等地,成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

第二,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唐以来,杭州逐渐成为江南丝织业的中心。至道元年(995),北宋王朝在杭设置“织务”,专门管理与收购本州及附近州县的丝织品^⑯。每年收购绢数高达二十五万匹,占浙东七州的三分之一强。《咸淳临安志》载,熙宁十年(1077),杭州及其所属九县的夏税是:纳绢九万五千八百三十一匹,绉(绸)四千四百八十六匹,绫五千二百三十四匹,绵五万四千两。崇宁年间,宋徽宗曾命童贯置局于苏、杭,仅织绣工匠即达数千人,可知规模之大。雕版印刷,杭州也居全国之首。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统计,“监本刊为杭者,殆居大半”。哲宗时,福建商人徐戡在杭雕印《夹注华严经》等书,运往朝鲜等地发售,获利甚厚,后被知州苏东坡所禁。^⑰元丰三年(1080),专门下了一道圣旨,“诏以新修经义付杭州镂板,……禁私印及鬻之者。”^⑱除此之外,酿酒、造船、制扇等业都很发达。“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岁课二十余万缗。”^⑲可见一斑。有一个统计资料,很能反映北宋杭州不仅工业生产不断发展,而且商业也相当繁荣:以熙宁十年(1077)为界,在此之前每年商税十二万贯左右,公元1077年商税高达十七万三千八百多贯,超过了江南大城市江宁府(五万七千二百八十三贯)、成都府(十七万一千六百三十一贯)、广州南海郡(六万八千六百九十五贯),比东京、西京、南京、北京等路还多。^⑳

第三、交通运输的发达。史载五代十国时期,钱塘江“舟楫辐辏,望不见首尾。”^㉑至北

宋,杭州的对外贸易蓬勃兴起,丝织品等当地产品大量输出。端拱二年(989)设杭州市舶司,开放为巨大的外贸港口之一。

“道通四方,海外诸国,物资丛居,行商往来,俗用不一。”蔡襄的序述,给我们留下了当年港口一派繁忙景象的剪影。

与此同时,沿钱江岸畔,运河两边,还形成了南场、北关、安溪、西溪、范浦、江涨桥、汤村、临平等卫星集镇,促进了物资有条不紊的吞吐和贸易全面均衡的发展。

第四、“山水之美名天下”。西湖之受人重视,始于唐代。据白居易《钱塘湖石记》纪述,唐人开发西湖,为的是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李泌刺杭时,“钱塘濒海,市民苦江水卤恶,难以安土,始凿六井、开阴窰、引湖水以资民汲。”^①解决饮水问题;其二,“筑钱塘湖堤,贮水防天旱”,解决数千顷良田的灌溉问题。五代时的做法也大致相同,置“撩湖兵士千人,专一开浚”。^②宋初历任知州,一仍旧传统,十分重视西湖水利的兴修。或如王济,“增置斗门以备溃溢之患”^③;或如郑戡,“发属县丁夫数万辟之”^④,诸如此类。而在疏浚开发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西湖山美水美景物美,实在是一处游赏胜地。相传宋初潘阆撰《酒泉子》十首,追忆杭州西湖之山水胜景,“一时盛传,东坡爱之,书之于玉堂屏风,石曼卿使画工绘之作图。”^⑤天禧年间(1017—1021),杭州知州王随在《放生池记》中称赞西湖:“宝刹相望,缘岸百余寺,烟景可爱,澄波三十里;实二浙之佳,一方之上游也”。此后,西湖山水越来越名驰遐迩,专为西湖而作的题咏也越来越多,大文豪苏轼更与杭州湖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归纳以上四个方面的叙述,我们可以这样推论:北宋末年的杭州,除了军事地形各有不同特点以外,其他方面实已超过建康。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对杭州与建康作了比较性的分析,这段话可作我们推论的补充,兹录之如下:

“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然二邦皆僭窃于乱世,乃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之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福足安乐,又其习俗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闽商海贾,风帆浪泊,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⑥

总之,南宋政权之所以定都临安,决非偶然。应该说,是由当时的军事势态以及杭州本身的经济、文化等条件而促成的。

【附记】 本文得到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主任徐规教授的指导和金敏同志的帮助,谨此志谢。

注:

-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建炎元年六月”。
- ② 《续资治通鉴》宋纪卷98“建炎元年六月”。
-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建炎元年六月”。
- ④ 《中兴小纪》卷二“建炎元年七月”。
- ⑤ 《续资治通鉴》宋纪卷98“建炎元年六月”。
- ⑥ 《宋史》卷二十五“高宗纪”。
- ⑦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二五。

- ⑧ 《宋史》卷378“卫肤敏传”。
- ⑨ 《续资治通鉴》宋纪卷98。
- ⑩ 《宋史》卷二十五“高宗纪”。
- ⑪ 《续资治通鉴》宋纪卷98“建炎元年六月”。
- ⑫ 《宋史》卷375“张守传”。
- ⑬ 《古今图书集成》卷111“建都部”。
- ⑭ 《宋史》卷380“楼炤传”。
- ⑮ 《古今图书集成》坤舆典“留都·艺文部”。
- ⑯ 《古今治平略·古今都会》（见《古今图书集成》第113卷“建都部”。）
- ⑰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七“建炎三年闰八月丁亥条”。
- ⑱ 《隋书》卷31“地理志”。
- ⑲ 李华《杭州判史厅壁记》
- ⑳ 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启》（见《文苑英华》卷六六〇）。
- ㉑ 《旧五代史》卷133“钱鏐”。
- ㉒ 《十国春秋》卷78“吴越”。
- ㉓ 《乾道临安志》卷三“郡守·张咏”。
- ㉔ 《宋史》卷175“食货志”。
- ㉕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〇“花石纲之役”。
- ㉖ 《论高丽第一状》（刊《东坡七集·奏议》卷六）。
- ㉗ 《咸淳临安志》卷四〇“诏令”。
- ㉘ 苏轼：《奏开西湖状》。
- ㉙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五、十六统计。
- ㉚ 《五代史补》卷五“契盈属对”。
- ㉛ 傅王露《西湖志》卷一“水利”。
- ㉜ 《宋史·河渠志》
- ㉝ 《宋史·王济传》
- ㉞ 《宋史·郑戢传》
- ㉟ 《历代诗余》，引《古今词话》。
- ㊱ 《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四十。